

三國外交使節之研究

胡志佳*

摘 要

外交與戰爭是國家處理國與國之間政治問題兩個主要的工具，前者是以談判來處理國與國之間的關係，而戰爭的爆發，則是象徵外交的失敗。三國鼎立之初，如何確保各領轄地之完整，如何強化內部之整頓與建設，是當務之急。於是各國之間的和平相處，是企望，也是必須的。在此考量之下，三國之間外交發展更勝於戰爭。

一般言，外交政策的發展與各政權內部發展情況有密切的關係，如曹魏政權，不論在曹操時期的挾天子以令諸侯，或曹丕以後掌握北方，擁有三國中最多的土地及資源，這些優勢使得曹魏在發展其外交策略時姿態較高，也因為實力雄厚，使其往往捨外交而直接取決於戰爭。反觀吳、蜀，在土地、人口甚至政治資本都不如曹魏的情勢下，往往必須透過結盟來制衡曹魏。但在曹魏勢力趨弱，或吳、蜀本國國勢強大的情況下，這種因現實政治利益而結合的盟約，很容易出現變化。

無論是例行性或是有特殊目的的交聘，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使節」的選派。一位優秀的使者，往往能為出使國爭取最大的利益。由於三國分合不定，使節在處理外交事務時充滿著困難與危險，所擔負的責任亦較重，是以三國所選派的使臣皆一時之選，口才、反應、文采以及對時局的瞭解為必備條件。自赤壁戰後，在魏、蜀、吳三個勢力互動中，有不少極佳的外交人才在三政權間縱橫。

本文希望透過對三國時期交聘史料的爬梳，一方面分析三國的外交背景，另一方面則展現三國時期使節所擔負的外交任務及使節選派的特色。

關鍵詞：三國、外交、使節

* 逢甲大學歷史與人文教學組專任副教授，中國文化大學史學博士。

壹、前言

中國近代以前所謂的外交關係大致有兩種，一種為外族對中國的臣服朝貢，這種外交關係多出現在中國大一統的時代；一種則為分裂時期，各政權之間的對等外交關係。後者以魏晉南北朝及南宋最為明顯，其中又以魏晉南北朝時期的外交關係更為複雜。

自曹丕代漢至陳朝滅亡（220年—589年），前後約三百八十年，其間僅有西晉短短五十年（265年—316年）可稱為大一統時期。此外，在南北之間不斷有著政權的建立與更迭。東晉以後，南北分立局面形成，此後南北之間的外交政策逐漸制度化，外交工作也在制度下推展。由於有機制可循，比較容易觀察，歷來史學家在這方面有所著墨，如趙翼《廿二史劄記》〈南北朝通好以使命為重〉條、¹鄭欽仁早期〈宋魏交聘表〉、²黎虎〈魏晉南北朝尚書主客曹及其外交管理職能〉³等文，此外，對魏晉之初的三國外交關係則明顯地忽略了。⁴

有學者以為三國時期魏、蜀、吳外交交鋒，在文化、學術層次上遠不如南北朝後期。⁵就文化學術上來看，或可以如此說；但若就外交任務的複雜及困難度來看，則三國可能較之南北朝以後的發展更有特色。因為就外交而言，南北朝對立的戰爭與和平，乃是兩股勢力間的關係，而三國時期是三個勢力間之和、戰、聯合等關係，其複雜性與多樣性，更具學術研究上的意義。

三國鼎立之初，如何確保各領轄地之完整，如何強化內部之整頓與建設，是當務之急。於是各國之間的和平相處，是企望，也是必須的。在此考量之下，三國之間外交發展更勝於戰爭。一般言，外交政策的發展與各政權內部發展情況有密切的關係，如曹魏政權，不論在曹操時期的挾天子以令諸侯，或曹丕以後掌握北方，擁有三國中最多的土地及資源，而外交是內政力量的延長，這些優勢使得曹魏在發展其外交策略時姿態較高；又因為實力雄厚，武力是國力的整體表現，遂使其往往捨外交而直接取決於戰爭。反觀吳、蜀，在土地、人口甚至政治資本

¹ 趙翼，《廿二史劄記》（台北，華世出版社，1977年）卷14〈南北朝通好以使命為重〉條，頁292-296。

² 鄭欽仁，〈宋魏交聘表〉，《大陸雜誌》第22卷6期（1961年3月31日），頁18-23。

³ 黎虎〈魏晉南北朝尚書主客曹及其外交管理職能〉，《漢學研究》第17卷2期（1999年12月），頁187-216。

⁴ 有關於三國外交問題過去研究少，一方面由於三國國祚短，國家體制未完全建立，許多在東漢末年已破壞的制度尚未建立；加之以前所留下的資料少，使得這方面的研究有限。有者也多為泛論，散見在一般《中國外交史》或《魏晉南北朝史》中，專論之文則未見。參見王仲榮《魏晉南北朝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傅啟學編著《中國古代外交史料彙編》（台北，國立編譯館中華叢書編審委員會，1980年）、黃寶實《中國歷代行人考》（台北，台灣中華書局，1969年）等。

⁵ 參見黎虎，前引文，頁210。

都不如曹魏的情勢下，往往必須透過結盟來制衡曹魏。但在曹魏勢力趨弱，或吳、蜀本國國勢強大的情況下，這種因現實政治利益而結合的盟約，很容易出現變化。

仔細爬梳史料，吾人可見三國時期外交，不僅爭「正統」，更重要的是在詭譎多變的局勢中，為本國謀取最大的利益。由於三國分合不定，使節在處理外交事務時充滿著困難與危險，所擔負的責任更重，是以三國所選派的使臣皆一時之選。自赤壁戰後，在魏、蜀、吳三個勢力互動中，有不少極佳的外交人才在三政權間縱橫。

本文希望透過對三國時期⁶交聘史料的整理，一方面分析三國的外交背景，另一方面則展現三國時期使臣所擔負的外交任務及使節選派的特色，來呈現三國時期在外交機制未建立之下所展開的精彩外交活動。

貳、三國外交背景

一、曹魏的外交

曹操自建安元年（196年）挾天子以令諸侯之後，努力擴張勢力，每經一次戰役，即累積更多的政治資本。官渡一戰（建安六年，201年），奠定了統一北方的基礎。但建安十三年（208年）赤壁之戰，孫權、劉備由敵對轉而合作，大敗曹軍，促使三分天下局面出現。赤壁之敗對曹操打擊頗大，統一全國的課題受阻。

面對劉、孫的結盟，雖然曹氏內部早有「吳有長江之險，蜀有崇山之阻，難以威服，易以德懷」之議，⁷曹操仍執意不斷派兵南征，在建安二十一年（216年）十月，曹操再次南征時，孫權在內有山越之亂，外有曹軍進逼的惡劣處境下，選擇背叛盟友劉備，「遣使詣曹公請降」，曹操亦「報使修好，誓重婚姻」，以女兒許配孫策之弟孫匡，又為兒子曹璋取孫賁之女。⁸

在陷劉備於孤立之後，曹操於建安二十三年（218年）七月，治軍西征劉備。自建安二十四年（219年）初，曹操主力軍之一夏侯淵與劉備軍隊戰於陽平，最後夏侯淵為劉軍所殺，激怒曹操親自率軍至陽平與劉軍對峙。⁹至七月，曹操在幾次敗仗後終於由關中撤軍，劉備於漢中稱王。這是自赤壁戰後曹操發展又一次

⁶ 本文討論的外交關係集中在魏、蜀、吳三國之間。為了有效觀察魏、蜀、吳三國之間外交的連橫合縱，本文所指的「三國時期」界定在建安十三年赤壁之戰。赤壁戰後，曹操、劉備、孫權，雖未正式建立政權，但三股勢力已成為當時中國主要支配力量。

⁷ 此為參軍傅幹之諫言，而曹操不聽，仍出兵，最後無功而歸。參見《三國志》卷1〈武帝紀〉，頁43-44註一裴松之注（以下簡稱「裴注」）引《九州春秋》。

⁸ 《三國志》卷47〈吳主傳〉，頁1120。

⁹ 《三國志》卷1〈武帝紀〉，頁51-52。

挫敗。終曹操掌權的二十四年內（建安元年至建安二十四年）挾漢獻帝之名，與劉備敵對，與孫權之間則僅有朝貢臣服之關係。

建安二十五年（220年）正月曹操死，經過長期太子王位之爭的曹丕終於取得尊榮，即位後，首先拒絕劉備友善的問弔。¹⁰二月，曹操才入土，這位新嗣位的魏王已迫不及待地要有一番作為。六月，不顧大臣的反對，率領大軍南征孫權。¹¹七月，孫權在恐懼之餘「遣使奉獻」。對曹丕而言，最大的收穫還是在這一年（建安二十五年，220年）十月，漢獻帝禪位，曹丕建立自己的曹魏政權，改元黃初。

黃初二年（221年）八月，孫權再度遣使奉章稱臣，曹丕以帝王之尊拜孫權為大將軍，並封吳王、加九賜。¹²黃初三年（222年）劉備因關羽被殺，傾大軍以攻孫權，孫權仍依附曹丕以求自保，使劉備大敗而歸，最後病死白帝城。

自建安二十五年至魏黃初三年（220年—222年），在曹魏勢力的壓力下，孫權以稱臣效忠行動，與曹氏建立頻仍的互動關係，甚至不惜以計殺關羽，以謀求曹丕的信任。但志得意滿的魏文帝曹丕，對孫權的俯首不脛一顧。曹丕並以極高的姿態遣使向孫權要求進貢江南珍物，這種超乎常典的要求，造成孫吳內部的不滿。¹³

總言之，曹魏以正統自居，其外交政策圍繞此主軸發展，也因擁有較豐沛的資源，常以高姿態逼迫孫吳、蜀漢臣服，而在無法達成目的時，則直接訴諸戰爭，較少利用和平外交手段，自政權建立至晉禪代，幾少主動交聘於蜀、吳二國。比較之下，在戰略上，曹魏攻取東吳所能獲得的利益較大，且魏吳攻守難易度相當。曹魏攻取蜀漢的困難度較高，其獲益較少，因此曹魏之軍事與外交以東吳為主。

二、蜀漢的外交

在蜀漢方面，建安之初，劉備的處境要比孫權險惡的多。寄人籬下，如何能佔穩地盤，擁有一方之地，是劉備首要工作。而建安十三年（208年）長坂之役，曹操以精騎五千大敗劉備，「獲其人眾輜重」，¹⁴重挫劉備的力量。劉備不得已轉

¹⁰ 《三國志》卷32〈先主傳〉，頁889註二裴注引《魏書》：「備聞曹公薨，遣掾韓冉奉書弔，並致賻贈之禮。文帝惡其因喪求好，敕荊州刺史斬冉，絕使命。」而《典略》說法不同。《三國志集註》（盧弼，台北，漢京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81年）引郝經之言，以為兩種說法皆魏自誇之辭。不論如何，這是蜀漢與曹魏交聘的唯一一條資料，頁766。

¹¹ 曹丕將出征，度支中郎將霍性以「先王之臣」上疏諫言，反對南征。曹丕在盛怒之餘，「遣刺奸就考竟殺之。」《三國志》卷2〈文帝紀〉，頁60，註三裴注引《魏略》。

¹² 同上註，頁78。

¹³ 這一年（黃初二年）魏文帝曹丕遣使至吳求雀頭香、大貝、明珠、象牙、犀牛角等珍寶，吳中大臣則上奏以「荊、揚二州，歲有常典，魏所求珍玩之物非禮也，宜勿與。」《三國志》卷47〈吳主傳〉，頁1124。

¹⁴ 《三國志》卷32〈先主傳〉，頁878。

向尋求也正受曹軍威脅的孫權的幫助，「遣諸葛亮自結於孫權」，¹⁵於是而有赤壁之役劉、孫聯手對抗曹操。

赤壁之戰之後局勢扭轉，三國鼎立之局出現，但也促使孫、劉之結盟從內在產生變化。戰後，劉備勢力日盛，孫權亦欲向外發展，二者的結盟開始出現裂痕。尤其在孫權建議共取蜀地未成之後，¹⁶雙方摩擦更大。爲了擴充勢力及有效防禦孫吳，於是劉備積極向蜀地擴展勢力，於建安十九年（214年）大破雒城，逼降劉璋，蜀地落入劉備之手。¹⁷建安二十年（215年）劉備又因荊州歸還問題與孫權產生衝突，¹⁸孫權「遣呂蒙襲奪長沙、零陵、貴陽三郡」，劉備則「引兵五萬下公安，令關羽入益陽」，兩方衝突一觸即發。¹⁹但就在這時候，曹操率大軍打下漢中，驅走張魯。這個軍事行動震撼了劉備與孫權，使二者不得不再結盟，荊州之分於焉形成，以湘水爲界，江夏、長沙、貴陽東屬孫權；南郡、零陵、武陵西屬劉備。此後劉備集全力對抗北邊的曹軍，終於在建安二十四年（219年），逼退曹軍，佔領漢中，並於同年秋天「於沔陽設壇」，在陳兵列眾，群臣陪位之下，即漢中王位。²⁰這是劉備發展最盛之時。

曹操在伐漢中不成，班師回朝後不久，於建安二十五年（220年）正月就死了，曹丕隨後禪漢即帝位。劉備於次年（建安二十六年，221年）亦稱帝，改元章武。²¹這一年七月，爲報關羽被殺之仇，劉備率軍親自伐吳。孫權欲透過外交關係請和，劉備「盛怒不許」，與權決裂。此後雙方交戰互有勝負。至章武二年（222年）六月，虓亭一戰劉備大敗，八月，回駐白帝。南征的失敗使劉備知道自己的困境，所以在十月，當孫權再度遣使求和時，劉備接受了，並遣太中大夫宗瑋回報。²²次年（章武三年，223年）劉備死於白帝城，在分和之間與孫權之外交劃下休止符。

蜀吳兩國的關係以劉備死亡作爲分水嶺，在劉備當政時期，對東吳既聯合又鬥爭，當曹魏兵臨長江時，有唇亡齒寒之慮，聯合居多。當此威脅減輕時，競爭又開始，爭執的重點在於荊州。蜀得荊州可北向威脅許都，可控東吳長江中游。諸葛亮清楚自己實力不足以分散，於是將重點放在六出祁山，攻取關中，而不圖謀東吳，外交上有妥協餘地。

¹⁵同上註。

¹⁶同上註，頁 878。

¹⁷同上註，頁 882-883。

¹⁸有關於荊州之爭，歷來學者討論很多，參見傅樂城〈荊州與六朝政局〉（收入氏著《漢唐史論集》，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77年），頁 96-101；尹韻公〈從荊州爭奪看三國前期的外交鬥爭〉（《文史哲》1981-5，1981年9月），頁 37-42。

¹⁹同上註，頁 883。

²⁰同上註，頁 885-886。

²¹同上註，頁 889。

²²同上註，頁 890。

劉禪繼位，在「政由葛氏，祭則寡人」的原則下，²³諸葛亮總蜀漢內外大事。由於劉備的兵敗虢亭，到死於白帝城，前後不到一年（章武二年六月—章武三年四月），這對蜀漢政局產生巨大震撼，內部動亂不斷湧現，²⁴北方曹魏政權亦虎視眈眈。在內憂外患之下，爲了國家的安全，「聯吳制魏」勢在必行。諸葛亮主動地派遣鄧芝固好於吳，孫權亦以禮回報，堅固二者之結盟關係。²⁵至建興七年（229年），當孫權稱帝，遣使至蜀，欲以二帝並稱，蜀漢內部大臣並不同意，但諸葛亮在考量內外情勢之下，仍遣衛尉陳震至武昌，與孫權「升壇歃盟，共分天下」。²⁶自此以後，在繼承漢室正統的國策下，諸葛亮將全部力量用於對付北方之曹魏。建興十二年（234年）諸葛亮死於北征途中，此後至蜀漢滅亡，內部不停的政治鬥爭以及日益頻仍的內亂，迫使蜀漢無力外顧，外交互動趨向消極。

三、東吳的外交

三國時期東吳大部分的時刻是採取積極主動的外交政策，尤其在孫權掌權時期，依違於魏、蜀之間。從其與兩國的互動來看，顯現其外交政策的無常性。

赤壁之戰後，孫氏主動、高頻率的與魏、蜀交聘，起自建安二十年（215年）劉備不肯歸還荊州兩方對立開始。此時，北方曹操亦不斷遣軍南下，孫權兩方受敵，合肥之戰甚至差點爲曹軍所擄。²⁷

另一方面由地理形勢來觀察，東吳位處長江中、下游，北與曹魏爲臨；長江上游的控制權又在劉備手中，以防守而言，兩方受敵。此時三方鼎立初成，各種遊戲規則尚未建立，三方彼此猜忌，加上內部山越爲亂等問題，對孫權而言，內憂外患之焦慮是可勾勒出來的。所以在建安二十二年（217年）春天，當曹操南下進駐居巢，攻濡須後，面對強大的壓力，孫權選擇依附北方曹氏對抗劉備，²⁸以化解兩面受敵之威脅。此後至劉備稱帝（221年）近五年間，孫權的外交政策大致是「聯曹制劉」。²⁹這其間孫權最大的斬獲，是建安二十四年（219年）十二月，擄關羽、定荊州。³⁰

東吳之聯曹制蜀的外交政策，在魏黃初二年（221年）以後逐漸發生變化。一方面劉備於本年四月稱帝於蜀，年號章武，開始對江南用兵，並策動武陵蠻反

²³ 《三國志》卷33〈後主傳〉，頁894 註二裴注引《魏略》。

²⁴ 同上註，頁894。

²⁵ 《三國志》卷35〈諸葛亮傳〉，頁918。

²⁶ 《三國志》卷33〈後主傳〉，頁896。

²⁷ 《三國志》卷47〈吳主傳〉，頁1120 註二裴注引《漢晉春秋》。

²⁸ 同上註，頁1120。

²⁹ 同上註，頁1123，註一裴注引《魏略》。

³⁰ 荊州是立國於江南政權之必爭之地，東吳得荊州，其國防才粗略完整，因此蜀吳爭荊州，東吳之決心大於蜀漢。

叛，造成孫權的困擾。³¹為解決來自於蜀漢的壓力，孫權所採取的是以行動展現對曹魏的效忠，以取得支持。³²但孫權的另一深層恐懼，來自於新即位的魏帝—曹丕身上。自曹丕即帝位，孫權前後數次遣使納貢稱藩求好，過程中，孫吳使臣感受到來自曹魏政權的不信任，如趙咨數度出使曹魏回朝後給孫權的建議：「觀北方終不能守盟，今日之計，朝廷承漢四百之際，應東南之運，宜改年號，正服色，以應天順民。」³³另一位使者沈珩回朝後亦提出：「臣聞兵家舊論，不恃敵之不犯我，恃我之不可犯，今為朝廷慮之。且當省息他役，惟務農桑以廣軍資；修繕舟車，增作戰具，令皆兼盈；撫養兵民，使各得其所；攬延英俊，獎勵將士，則天下可圖矣。」³⁴這些訊息，令孫權必須重新思考其佈局。

促使孫權轉變外交政策的導火線，則是曹丕直接求任子，要求孫權表態，並三路出軍壓迫江東。³⁵孫權再三逃避，引起曹魏朝中大臣不滿，甚至有以孫權「為犬羊之姿，橫被虎豹之文，不思靖力致死之節，以報無量不世之恩」，而建議「請免（孫）權官，鴻臚削爵土，捕治罪。敢有不從，移兵進討，以明國典好惡之常，以靜三州元元之苦。」³⁶在得不到孫權正面的回應之下，黃武元年（222年）十一月，曹魏大軍來襲，史載：「曹休使臧霸以輕船五百、敢死萬人襲攻徐陵，燒攻城車，殺略數千人。」³⁷雖在反攻的過程中，孫吳將軍全琮、徐盛「斬魏將尹廬，殺獲數百」³⁸亦有所獲，但在曹魏交相逼迫之下，十二月，孫權主動派遣使者求和於劉備，³⁹聯蜀制魏之外交政策於焉成形。

黃武五年（226年）是孫吳政權發展的關鍵年，這一年七月，對孫氏最不友善的魏文帝曹丕死，江東內部長久以來擾亂不歇的山越也平定了；⁴⁰長江上游的蜀漢政權劉禪，在諸葛亮的輔佐下，正致力於內政的發展。在天時地利人和之下，孫權於黃龍元年（229年）四月，以「漢氏以絕祀於天，皇帝位虛，郊祀無主……曆數在躬，不得不受」之辭，於江東即皇帝位。⁴¹六月，趁蜀漢遣使陳震慶賀孫權踐位之際，孫權主動與蜀漢盟誓，議分天下，並以「自今日漢吳既盟之後，戮力一心，同討魏賊」之語，正式與曹魏決裂。⁴²

³¹ 同上註，頁 1122、1124-1125。

³² 同上註，頁 1125 註一裴注引《吳歷》載：「（孫）權以使聘魏，具上破（劉）備獲印綬及首級、所得土地，並表將吏功勤宜加爵賞之意。」

³³ 同上註，頁 1124 註四裴注引《吳書》。

³⁴ 同上註，頁 1124 註五裴注引《吳書》。

³⁵ 同上註，頁 1125。

³⁶ 同上註，頁 1127 註二裴注引《魏略》。

³⁷ 同上註，頁 1126。

³⁸ 同上註。

³⁹ 同上註。

⁴⁰ 同上註，頁 1132-1133。

⁴¹ 同上註，頁 1135。

⁴² 同上註，頁 1134-1135。

至此以後東吳的外交策略更爲積極主動，面對北方曹魏政權的威脅，除了繼續與蜀漢的結盟外，孫權也向外尋求發展的空間。首先，於黃龍二年（230 年）遣衛溫、諸葛直「將甲士萬人，浮海求夷洲及亶洲。」⁴³三年（231 年）春二月，派遣潘濬率眾五萬討武陵蠻夷。⁴⁴嘉禾元年（232 年）三月，再遣周賀、裴潛乘海至遼東與公孫淵接觸，並在舉朝大臣皆以公孫淵不可信的諫議之下，仍強行封淵爲燕王，結果全軍覆沒。⁴⁵這次行動對東吳打擊甚大，同時也使得曹魏無後顧之憂，而東吳祇有向南方發展，外交發展受阻。在孫權死後，東吳的外交政策亦轉趨保守，表面上與魏和睦，潛在的仍實行聯蜀制魏。

參、三國使節之選派

三國時期互爲友好的交聘活動一直進行著。《三國志》及相關史料，記錄了許多爲達成目的而出使的場景。這些使命，有的容易完成，有的則是背負兩國和戰關鍵；如此一來，使臣所擔負的責任重大，使臣的選派也變得十分重要。

由附錄「三國交聘表」來看，三國期間魏、蜀、吳三國共有 46 次有紀錄交聘活動。其中使者有姓名可查的共計 69 人，其中更有多人多次縱橫於三國之間。

46

交聘國	次數
魏→蜀	0
魏→吳	6
蜀→魏	2
蜀→吳	14
吳→魏	12
吳→蜀	12
合計	46

表中所示，魏蜀、蜀魏交聘共得二例，顯示魏蜀關係僵化，外交活動少，而軍事行動多，其中原因是蜀漢自始以繼承漢室自居，欲恢復中原。而曹魏最懼中原人士心懷漢室，對曹政權威脅甚大。

⁴³ 《三國志》卷 52〈張昭傳〉，頁 1223。

⁴⁴ 《三國志》卷 47〈吳主傳〉，頁 1136。

⁴⁵ 同上註，頁 1138-1139。另參見黎虎，〈孫權對遼東的經略〉，《北京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1994-5（總 125 期），1994 年 9 月，頁 41-47。

⁴⁶ 如孫吳使者趙咨「頻載使北」、馮熙「使蜀還，為中大夫。後使於魏」；蜀漢費禕「以奉使稱旨頻繁至吳」等，參見《三國志》卷 47〈吳主傳〉，頁 1123-1124 註四裴注引《吳書》、頁 1130-1131 註三裴注引《吳書》；卷 44〈費禕傳〉，頁 1061。

一、曹魏使節之選派

從曹魏政權來看，在 9 次主動出使中，留名的使者有 7 人，其中周賀、裴潛、傅容、聶夔，為出使遼東公孫淵之使者。其他三人，辛毗、桓階、邢貞在黃初初年使吳，主要任務為與孫權盟誓並徵任子及封權為吳王，藉此確立曹魏正統地位。⁴⁷而另外浩周也是因與孫權熟識，⁴⁸曹丕要利用浩周說服孫權遣任子臣服，這些出使都是為了同一件事。

從出使任務來看，9 次出使中，對孫吳佔了 6 次，而且大都集中在魏文帝曹丕時期。這段期間可說是曹魏聲勢最高的時期，曹魏派出的使者態度高傲，常引起受訪國東吳的不滿。黃初二年（221 年）八月，在孫權請降稱臣後，魏文帝曹丕派太常卿邢貞持節至吳，策拜孫權為吳王加九錫。⁴⁹由於有君臣之別，邢貞至吳時姿態甚高，孫權率百官出都亭迎接。邢貞見了孫權不但不下車，而且面帶驕色。這無禮的態度，激怒了孫吳大臣，其中孫吳老臣張昭即喝止邢貞曰：「夫禮無不敬，故法無不行。而君敢自尊大，豈以江南寡弱，無方寸之刃乎！」⁵⁰行列中的中郎將徐盛涕泗縱橫地對左右說：「盛等不能奮身出命，為國家并許洛，吞巴蜀，而令吾君與貞盟，不亦辱乎」，⁵¹這場景讓邢貞也不得不動容。⁵²

曹魏因所留使節資料較少，較不易掌握其特色，由出使者官位來看，侍中辛毗（三品）、尚書桓階（三品）、太常邢貞（三品），官品皆高，或可說是曹丕為了逼迫孫權臣服而做的安排，⁵³欲以高官位壓迫孫權。而以人才特質來看，辛毗「當世知名，忠亮，計略高，骨鯁，性剛而專」，⁵⁴桓階則是「有謀略，才周當世」，⁵⁵可知計略、才性為曹魏出使者應備的條件。這種屈辱對方式的外交，是中國強對弱的典型作風。

除了派出使節完成交聘外，對於來訪的他國使節，曹魏君主亦相當重視。三國中曹魏外交來往的主要對象是東吳，是以每當東吳使節來訪時，曹魏君主往往親自接見之，其主要目的為探訪東吳內部發展狀況，其中又以魏文帝最積極，由

⁴⁷ 《三國志》卷 47〈吳主傳〉，頁 1125。

⁴⁸ 浩周本為魏舊臣，為孫權所俘，受孫權賞識。曹丕即位，孫權為表示友好，特別將浩周釋回。此後曹丕為壓迫孫權送任子，也不斷請浩周至孫吳為說客並探虛實。參見同上註，頁 1127-1129 註三裴注引《魏略》。

⁴⁹ 《三國志》卷 52〈張昭傳〉，頁 1221。

⁵⁰ 同上註。

⁵¹ 《三國志》卷 55〈徐盛傳〉，頁 1298。

⁵² 《三國志》載：「（邢）貞聞之謂其旅曰：『江東將相如此，非久下人者也。』」同上註。

⁵³ 《三國會要》（錢儀吉，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 年）卷 23〈職官二〉，頁 459。

⁵⁴ 《三國志》卷 25〈辛毗傳〉，頁 698。

⁵⁵ 《三國志》卷 22〈桓階傳〉，頁 631。

其對話內容也可看出曹丕態度之高傲。如下表：⁵⁶

使者	魏文帝問話	使者答話
趙咨	「吳王何等主也？」	「聰明仁智雄略之主也。」
趙咨	1. 「吳王頗知書乎？」 2. 「吳可征不？」 3. 「吳難魏不？」 4. 「吳如大夫者幾人？」	1. 「吳王浮江萬艘，帶甲百萬，任賢使能，志存經略，雖有餘閒，博覽書傳歷史，藉採奇異，不效諸生尋章摘句而已。」
沈珩	1. 「吳嫌魏東向乎？」 2. 「聞太子當來，寧然乎？」	1. 「信恃舊盟，言歸于好，是以不嫌，若魏渝盟，自有豫備。」 2. 「臣在東朝，朝不坐，宴不與，若此之議，無所聞也。」
馮熙	1. 「吳王若欲脩宿好，宜當厲兵江關，縣旆巴蜀，而復聞遣脩好，必有變故。」 2. 「聞吳國比年災旱，人物凋損，以大夫之明，觀之如何？」	1. 「臣聞西使直報問，且以觀釁。非有謀也。」 2. 「吳王體量聰明，善於任使，賦政施役，每事必咨，教養賓旅，親賢愛士，賞不擇怨仇，而罰必加有罪，臣下皆感恩懷德，惟忠與義。帶甲百萬，穀帛如山，稻田沃野，民無饑歲，所謂金城湯池，彊富之國也，以臣觀之，未可量也。」
陳化	1. 「吳、魏峙立，誰將平一海內者乎？」 2. 「昔文王以西伯王天下，豈復在東方乎？」	1. 「《易》稱帝出乎震，加聞先哲知命，舊說紫蓋黃旗，運在東南。」 2. 「周之初基，太伯在東，是以文王能興於西。」

魏文帝與孫吳使者對話表

由對話來看，魏文帝接見來使主要目的，是透過使者來了解出使國的政治動向、軍事部署、人才發展及君主態度，從使者的對談中多少可以掌握他國的部分訊息。這種報聘外交，雙方並未進行實質談判，僅做口頭交鋒，自吹自誇，不失立場，如趙咨、馮熙、陳化之對答，或相託不知，如沈珩之回答。

黃初三年以後，曹魏與孫權使者來往不絕，但就曹魏部分，《三國志》等相關史料中卻未留下其他使者記錄，這並不代表曹魏無使，或可能因是例行性的交聘，陳壽在選擇史料時割捨了。無論如何，由於曹魏在三國之中實力大過於蜀、吳，外交對其而言並非迫切，這可能也是資料缺乏的因素之一。

二、蜀漢使節的選派

聯吳制魏為劉備死後確立的外交政策，但蜀漢的危機在於面對東吳，尤其是孫權時期外交政策搖擺不定，這較之於與曹魏明確地與蜀漢對立態度更複雜，使得蜀漢在處理外交問題上倍增困難。

⁵⁶表中對話請參見附錄「三國交聘表」之「資料出處」欄。

自建安十三年迄蜀漢滅亡（208年—263年），有資料可查的蜀漢交聘活動共有17次，其中對魏、吳之交聘有16次，使節13人。由「三國交聘表」來看，劉備在位時期，爲了擴張勢力，孫權、劉備使者不斷來往於兩國間。赤壁之役、荊州之爭、漢中危機，⁵⁷二者在分合中度過。此後蜀漢外交對象仍以孫吳爲主，而且大部分的外交活動集中在諸葛亮執政時期（章武二年—建興十二年，222年—234年）。而諸葛亮死後，蜀漢外交政策轉趨保守。

在五十餘年間，蜀漢與曹魏的交聘往來只有兩次記錄可尋，一次在建安二十五年（220年）曹操死，劉備派使者問弔，結果曹丕以前一年曹操漢中退兵而不諒解劉備，憤而不接受弔問之禮。⁵⁸另一次在蜀漢炎興元年（263年），蜀漢後主遣侍中張紹、光祿大夫譙周、駙馬鄧良請降。⁵⁹此外二者之間非例行性的交聘則未有資料。

由使節出使者及其官職來看：

諸葛亮	（建安十三年赤壁戰前未列官職）
伊籍	左將軍從事中郎
韓冉	軍謀掾
馬良	左將軍掾
宋禕	太中大夫
費禕	昭信校尉
董恢	宣信中郎
鄧芝	尚書，以中郎將出使
陳震	尚書令（另一次爲衛尉）
張奉	（不詳）
宗預	參軍右中郎將
樊建	校尉
張紹	侍中
譙周	光祿大夫
鄧良	駙馬

蜀漢所派使節的標準與曹魏、東吳相同，尙未制度化，並非固定官職，往往因事、因人而派。如章武二年（222年），劉備在永安宮去世，諸葛亮正擔心孫權聽到劉備死訊會有別的打算，正在盤算下一步時，鄧芝建議：「今主上幼弱初在位，宜遣大使重申吳好」，諸葛亮回答：「吾思之久矣，未得其人耳，今日始得之！」

⁵⁷ 建安十三年赤壁之戰曹操促使孫劉結盟；荊州之爭，又使孫劉反目；至建安二十年曹操征漢中，又使孫劉合作。

⁵⁸ 參見註10。

⁵⁹ 《三國志》卷33〈後主傳〉，頁900。

⁶⁰可知鄧芝之出使，非其常職而是臨時徵派。

蜀漢徵選外交使節雖為臨時徵派，但有其考量，從上所列名單來觀察，這些人多為當時蜀漢權力核心人物，瞭解內政與時務。早期除諸葛亮外，如伊籍，與劉備關係密切，⁶¹馬良則為諸葛亮引薦受重用之人才，⁶²中期如費禕、宗預等人，皆為諸葛亮大力提攜之人才，⁶³其他如鄧芝、陳震、樊建、蔣顯、張紹、譙周等人，位居中央官職，對國家政事及時局有相當認識。由此可見蜀漢是以能把握時局發展動脈的人，擔任外交出使工作。

當本國內部局勢不安則必須要主動進行外交以避免節外生枝，蜀漢前後兩次以主動的外交化解可能發生的危機。如前所述，第一次在章武二年（222 年）劉備死後，諸葛亮擔心孫權聞訊「恐有異計」，即派鄧芝出使，由於鄧芝的努力，使得原本狐疑的孫權化解心結，遣張溫回聘於蜀。⁶⁴史載：

……(鄧芝至吳)(孫) 權果狐疑，不時見芝，芝乃自表請見權曰：「臣今來亦欲為吳，非但為蜀也。」權乃見之，語芝曰：「孤誠願與蜀和親，然恐蜀主幼弱，國小勢偏，為魏所乘，不自保全，以此猶豫耳。」芝對曰：「吳、蜀二國四州之地，大王命世之英，諸葛亮亦一時之傑也。蜀有重險之固，吳有三江之阻，合此二長，共為唇齒，進可并兼天下，退可鼎足而立，此理之自然也。大王今若委質於魏，魏必上望大王之入朝，下求太子之內侍，若不從命，則奉辭伐叛，蜀必順流見可而進，如此，江南之地非復大王之有也。」權默然良久曰：「君言是也。」遂自絕魏，與蜀連和。

⁶⁰ 《三國志》卷 45〈鄧芝傳〉，頁 1071。

⁶¹ 《三國志》卷 38〈伊籍傳〉載：「(籍) ……隨先主南渡江，從入益州。……見待亞於簡雍、孫乾等。」頁 971。

⁶² 《三國志》卷 39〈馬良傳〉，頁 982-983。

⁶³ 參見《三國志》卷 44〈費禕傳〉，頁 1060、卷 45〈宗預傳〉，頁 1075。

⁶⁴ 同上註，頁 1071-1072。

第二次是諸葛亮死於北伐途中，孫吳顧慮到魏趁亂取蜀的可能性，於是增加與蜀臨界的巴丘守兵萬人，另也盤算著若蜀可救則救之，若蜀遭重挫，則或可從中取利；面對嚴峻的外來威脅，蜀漢一方面在永安增加守兵以防非常。一方面派遣宗預出使孫吳，宗預以不卑不亢的機智態度，化解孫權的猶疑。⁶⁵《三國志》載：

……(宗預將命使吳)(孫)權問曰：「東之與西，譬猶一家，而聞西更增白帝之守，何也？」預對曰：「臣以為東益巴丘之戍，西增白帝之守，皆事勢宜然，俱不足以相問也。」權大笑。

由於孫權本身非常重視外交，對來訪的他國使者也相當重視，而其中最多的就是來自於蜀漢的外交使節。這些蜀漢的使者所面對的是外交政策隨時會改變的東吳國君，這種挑戰不可謂不大。從史料中來看，蜀漢使者在面對東吳君主時，大多反應要快並據理力爭，以不使自己國家蒙羞為原則。《三國志伊籍傳》載：

……遣東使於吳，孫權聞其才辯，欲逆折以辭。(伊)籍適入拜，權曰：「勞事無道之君乎？」籍即對曰：「一拜一起，未足為勞。」……權甚異之。⁶⁶

《三國志費禕傳》載：

……以禕為昭信校尉使吳。孫權性既滑稽，嘲啁無方，諸葛恪、羊昌等才博果辯，論難鋒至，禕辭順義篤，據理以答，終不能屈。⁶⁷

《費禕別傳》另載：「孫權每別酌好酒以飲禕，視其已醉，然後問以國事，並論

⁶⁵ 《三國志》卷 45〈宗預傳〉，頁 1075-1076。

⁶⁶ 《三國志》卷 38〈伊籍傳〉，頁 971。

⁶⁷ 《三國志》卷 44〈費禕傳〉，頁 1060-1061。

當世之務，辭難累至。禕輒辭以醉，退而撰次所問，事事調答，無所遺失。」⁶⁸

孫權對表現優秀的蜀漢使者往往傾心以待，如鄧芝、宗預、費禕等人，⁶⁹而使者也藉著孫權的信任，為本國進一份心力。如宗預，在多次出使東吳，與孫權建立良好關係，在一次的交聘中，孫權「捉預手，涕泣而別曰：『君每銜命結二國之好。今君年長，孤亦衰老，恐不復相見！』」遣預大珠一斛。」宗預也把握時機向孫權進言說：「蜀土僻小，雖云鄰國，東西相賴，吳不可無蜀，蜀不可無吳，君臣憑恃，唯陛下重垂神慮。」⁷⁰

蜀漢使節出使也非無往不利，一不小心也可能馬前失蹄，如孫權在位時，張奉奉詔出使，於東吳宴會中，張奉列舉東吳尚書闕澤的姓名來嘲諷闕澤，而闕澤不能答，張奉正在得意之際，孫吳代理僕射尚書孫綜出面，以敏捷的言辭讓張奉下不了台。史載：

西使張奉於（孫）權前列尚書闕澤姓名以嘲澤，澤不能答。（孫）綜

下行酒，因勸酒曰：「蜀者何也？有犬為獨，無犬為蜀，橫目苟身，

虫入其腹。」奉曰：「不當復列君吳邪？」綜應聲曰：「無口為天，有

口為吳，君臨萬邦，天子之都」，於是眾坐喜笑，而奉無以對。⁷¹

另如口才極佳的費禕，在初出使東吳時，也曾受困於東吳筵席之上。孫權在大醉之後，以「楊儀、魏延，牧豎小人也。雖嘗有鳴吠之益於時務，然既已任之，勢不得輕，若一朝無諸葛亮，必為禍亂矣。諸君憤憤，曾不知防慮於此，豈所謂貽厥孫謀乎？」質問蜀漢內政，費禕錯愕不能答，幸賴副使董恢機智的以「儀、延之不協起於私忿耳，而無鯨、韓難御之心也。今方掃除疆賊，混一區夏，功以才成，業由才廣，若捨此不任，防其後患，是猶備有風波而逆廢舟楫，非長計也。」⁷²化解尷尬，也為蜀漢維持應有的尊嚴。⁷³

綜而言之，由於東吳外交政策首尾不一，是以蜀漢派出之使者所擔負的責任

⁶⁸同上註，頁 1061 註一裴注引《費禕別傳》。

⁶⁹《三國志》卷 44〈費禕傳〉，頁 1060-1061、卷 45〈鄧芝傳〉，頁 1072、卷 45〈宗預傳〉，頁 1076。

⁷⁰《三國志》卷 45〈宗預傳〉，頁 1076 註二裴注引《吳歷》。

⁷¹《三國志》卷 53〈薛綜傳〉，頁 1250-1251。

⁷²《三國志》卷 39〈董允傳〉，頁 986-987 註一裴注引《襄陽記》。

⁷³諸葛亮聽聞董允的回答，「以為知言，還未滿三日，辟（董允）為丞相府屬，遷巴郡太守。」同上註。

及面對不定的因素也更多。從上述例子觀察，蜀使不但對答機敏，且對於三國之間的關係，以及蜀漢內部的政情都很熟悉，蜀漢對東吳的外交，一般而言是成功的。

三、東吳使節之選派

三國中蜀漢與東吳非常重視使臣的選派，其中以東吳尤甚。以東吳而言，在其七十餘年的國祚裡，外交聘問成爲獲取國家利益的重要工具。由「三國交聘表」來看，三國互動的 46 次的交聘活動中，東吳主動與魏、蜀的交聘行動即達 24 次，遠多於曹魏的 6 次與蜀漢的 16 次；其中對魏 12 次，對蜀 12 次，這更顯示外交對東吳的重要性。而東吳有記錄的 30 次出使中，有 26 次出現在孫權掌權時期。

由東吳派出留有記錄的使者官職來分析：

出使官職	人數
中司馬	1
都尉	1
校尉	2
中大夫	1
西曹掾	1
太中大夫	1
輔義中郎將	1
郎中令	2
侍中	1
五官中郎將	5
散騎中常侍加駙馬都尉	1
光祿大夫	1
大鴻臚	1

東吳前期出使者的官職並不是最重要的考量，也較沒有原則可尋；後期較特殊的是在廢帝孫亮以後的八位使者中，有五位是以「五官中郎將」爲職出使。⁷⁴這是否說明孫吳在外交行政上將欲走向制度化，由於所能觀察的時間不夠長及資料不夠多，僅提出現象說明之。

東吳大部分重要的使節出現在孫權與曹魏關係最緊張的時期，即曹丕初即位時。由於曹丕不斷派使者徵孫權任子，壓迫孫權稱臣。面對這一困境，孫權前後派出趙咨、沈珩、馮熙等人至曹魏，緩和兩國的緊張；另一方面也派使者鄭泉、張溫、殷禮、陳化等人至蜀，尋求與蜀漢的合作空間。由於孫權外交政策以本國

⁷⁴ 廢帝以後的出使者官職，濮陽興（五官中郎將）、刁玄（五官中郎將）、薛翊（五官中郎將）、王蕃（散騎中常侍加駙馬都尉）、紀陟（光祿大夫）、弘璆（五官中郎將）、丁忠（五官中郎將）、張儼（大鴻臚）。

利益為考慮，常呈現首尾不一的態度，往往令相交國不滿，更加深使者出使時的困難。

從出使任務來分析，東吳對曹魏以請降、稱臣而出使者最多，請和與弔祭次之；對蜀漢則以結盟為主，求馬、弔祭為次。由此也可見東吳基本外交政策中，對曹魏與蜀漢態度是有差別的。⁷⁵在本國國勢較弱，無法與他國抗衡之餘，往往透過使臣求和、求降，以謀求戰爭以外的關係。⁷⁶

東吳在檢選使節時，官位高低不是最重要之標準。由東吳使節個人特色來看：

諸葛瑾	有容貌思度，于時服其弘雅
趙咨	反應快，博聞多識，應對辯捷
沈珩	敏達延譽，有智謀，能專對
馮熙	言辭鋒利，反應快
鄭泉	博學有志
張溫	才藻俊茂，文辭占對，容貌奇偉，反應快、博學
殷禮	潛識過人
申儀	清恪貞素
濮陽興	有士名
王蕃	博覽多聞，兼通術藝
紀陟	有見識，反應好

反應快、博學、言辭鋒利為東吳使節重要的特質，魏晉以後重容止的風氣，還未成為此時選拔使節的標準。⁷⁷使者至出使國最大的挑戰為與該國國君與大臣之應對，使節出使代表著一國國君，這時使臣如何應對得宜，成為一門學問，是以反應快、言辭鋒利，成為必要條件。而上述使者官職之分析，除五官中郎將以外，其他官職似乎備顧問或能接近中樞之職，對東吳朝廷政事有所瞭解。

劉備初稱帝，東吳為聯蜀以制魏，特派使者鄭泉聘於蜀，劉備正以其稱帝正名與否忐忑不安，於是問鄭泉：「吳王何以不答吾書，得無以吾正名不宜乎？」面對如此尖銳之問題，鄭泉不為所懼地回答：「曹操父子陵轢漢室，終奪其位，

⁷⁵ 對曹魏有稱臣之舉；而對蜀漢，最高層次僅至結盟、求和，而無稱臣。

⁷⁶ 如建安二十二年（217年），曹操連年南征，孫權在無力應付之餘，只得遣使請降。魏黃初元年（220年）曹丕即帝位，孫權再遣使稱藩，此後至黃初三年（222年）間，孫權不斷遣使稱臣於魏，以求得與曹魏的和平共存。孫吳另一次為求和而出使的情況亦出現在此同時，孫權一方面向曹魏稱臣，但一方面卻因殺關羽一事激怒了劉備，建安二十六年（221年），劉備在即皇帝位後，率軍親自伐吳，孫權欲透過外交關係請和，劉備不許，與權決裂，此後雙方交戰，互有勝負。至蜀漢章武二年（222年）六月，猇亭一役蜀漢大敗，使劉備知道自己的困境，所以在十月當孫權再度遣使求和時，劉備接受了，並遣使回報。參見《三國志》卷32〈先主傳〉，頁890、卷47〈吳主傳〉，頁1119。

⁷⁷ 黃寶實《中國歷代行人考》指出「南北朝以後使節來往，但重才地，尚風華，至於軍國重事則鮮有涉及」，頁189。

殿下既為宗室，有維城之責，不荷戈執殳為海內率先，而於是自名，未合天下之議，是以寡君未復書耳。」劉備面對如此責難也無言以對。⁷⁸

另如，吳甘露元年（265年），此時為司馬氏初平蜀，氣勢最盛，司馬昭派昔日孫吳壽春降將徐紹、孫彧至吳，陳事勢利害，以「舟師泛江，順流而下，陸軍南轅，取徑四郡，兼成都之械，漕巴漢之粟，然後以中軍整旅，三方雲會，未及浹辰，可使江表底平，南夏順軌」來威脅孫皓，⁷⁹孫皓在不得已的情況下，派遣使者紀陟、弘璆陪同徐紹、孫彧回洛陽，以低姿態表達對司馬氏的友善。紀陟、弘璆至魏一路中受到曹魏君臣不斷的挑釁。如干寶《晉紀》所載：

（紀）陟、（弘）璆奉使如魏，入境而問諱，入國而問俗。（魏）壽春

將王布示之馬射，既而問之曰：「吳之君子亦能斯乎？」陟曰：「此軍

人騎士肄業所及，士大夫君子未有為之者也。」布大慚。既至，魏帝

見之，使僮問曰：「來時吳王何如？」陟對曰：「來時皇帝臨軒，百寮

陪位，御膳無恙。」晉文王饗之，百寮畢會，使僮者告之：「某者安

樂公也，某者匈奴單于也。」陟對曰：「西主失土，為君王所禮，位

同三代，莫不感義，匈奴邊塞難羈之國，君王懷之，親在坐席，此誠

威恩遠著。」⁸⁰

並非所有的君主都有劉備的雅量，如「魏文帝與孫權使者對話表」中所載，孫吳使者至魏，由於大多非平等的外交關係，曹魏君主往往用尖銳的語言提出問題，這些使者態度必須和緩恭敬，否則易遭殺身之禍；如上所列的東吳使者馮熙，在與曹丕對話後，引起曹丕極度的不滿，派馮熙同郡人陳群以重利收買，結果「熙不為迴。送至摩陂，欲困苦之。後又召還，未至，熙懼見迫不從，必危身辱命，乃引刀自刺」，馮熙最後死在曹魏。⁸¹

⁷⁸ 《三國志》卷47〈吳主傳〉，頁1129註四裴注引《吳書》。

⁷⁹ 同上註，頁1163註三裴注引《漢晉春秋》。

⁸⁰ 《三國志》卷48〈三嗣主孫皓傳〉，頁1165註一裴注引干寶《晉紀》。

⁸¹ 同上註，頁1130-1131註三裴注引《吳書》。

但對於表現好的使者，接待國君主常以超乎使節之禮結交，甚至以厚禮餽贈。如東吳使者沈珩使魏，魏文帝曹丕「引珩自近談語終日」；⁸²另一使者陳化，曹丕「心奇其辭，使畢當還，禮送甚厚」。⁸³

除了應付來自國君的詢問，大臣間也常與使節在不同的宴會場景中較量。孫吳寶鼎元年（晉泰始二年，266 年），晉初禪魏，氣勢盛，張儼及張忠奉旨弔祭晉文帝喪，孫皓知此行之艱難，臨行語張儼：「今南北通好，以君有出境之才，故相屈行。」儼等人至晉，車騎將軍賈充、尚書令裴秀、侍中荀勗等「欲傲以所不知」，幸賴張儼等人反應快，未被駁倒。⁸⁴

由於東吳重視外交，不僅靠著外交取得利益，並利用這些使節出使之便，將各國情報帶回來，所以使節對他國的觀察，往往成為國君重要參考依據。如魏黃初二年（221 年）曹丕欲封權子孫登，孫權遣西曹掾沈珩出使至魏陳謝辭封。沈珩回吳之後向孫權呈報：「臣密參侍中劉曄，數為賊設姦計，終不久覈。臣聞兵家舊論，不恃敵之不犯我，恃我之不可犯，今為朝廷慮之。」⁸⁵充分顯示使臣對局勢的掌握。另如東吳甘露元年（晉泰始元年，265 年）三月，東吳遣大鴻臚張儼、五官中郎將丁忠使晉弔祭司馬昭。經丁忠的觀察，當時形勢為「北方守戰之具不設，弋陽可襲而取之。」此時因晉新平蜀，氣勢最盛，大局對東吳不利，因此孫皓在徵詢群臣意見後，採納了劉纂之「宜遣閒諜以觀其事」。⁸⁶

肆、結語

三國外交政策的發展與各政權內部發展情況有密切關係，曹魏以正統自居，其外交政策圍繞這個主軸發展，也因擁有較豐富的資源，常以高姿態逼迫東吳、蜀漢臣服，而在無法達成目的時，則直接訴諸戰爭，較少利用和平外交手段。是以曹魏所派出使者姿態也最高，常引起受訪國的不滿。在三國留有記錄的 46 次交聘活動中，曹魏主動者僅佔 6 次，更可說明曹魏的外交態度。

蜀漢自始與曹魏爭奪漢室正統地位，兩者之間始終敵對，為了有效抵擋曹魏的威脅，聯吳制曹勢在必行。但面對東吳首尾不一的外交態度，蜀漢主事者對外交事務的掌握更形重要。蜀漢在劉備及諸葛亮死時兩次危機，都賴主事者及使節化解關鍵性危機。而蜀漢使節皆一時之選，這些人在蜀漢政治發展中扮演重要角色。

東吳則因位處長江中、下游，北與曹魏為臨，長江上游控制權又在蜀漢手中，

⁸²同上註，頁 1124 註五裴注引《吳書》。

⁸³同上註，頁 1132 註二裴注引《吳書》。

⁸⁴同上註，頁 1166 註一裴注引《吳錄》：「車騎將軍賈充、尚書令裴秀、侍中荀勗等欲傲以所不知而不能屈。尚書僕射羊祜、尚書何楨並結縞帶之好。」

⁸⁵同上註，頁 1123-1124。

⁸⁶《三國會要》卷 25〈職官四〉，「出使」條，頁 485。

初期內部山越爲亂不休，這些因素促使東吳採取積極主動外交政策，尤其在孫權掌權時期，依違於魏、蜀之間，從其與兩國的外交互動來看，顯現其外交政策的無常性。東吳大部分重要的使節出現在孫權與曹魏關係最緊張的時期，即曹丕初即位時。由於曹丕不斷派使者徵孫權任子，壓迫孫權稱臣。面對這一困境，孫權前後派出趙咨、沈珩、馮熙等人至曹魏，緩和兩國的緊張；另一方面也派使者鄭泉、張溫、殷禮、陳化等人至蜀，尋求與蜀漢的合作空間。由於孫權外交政策以本國利益爲考慮，常呈現首尾不一的態度，往往令相交國不滿，更加深使者出使時的困難與危險。

三國五十餘年期間魏、蜀、吳三國互動關係有 46 次。其中使者有姓名可查的共計 69 人。三國外交共通的特色，有以下幾點：

- 一、由於國家體制不及建立，使得外交機制也未臻健全，這使得使節出使時面對的變數更大。
- 二、兩漢爲大一統帝國，其對外以宗主國自居，經長時期發展，有著制度化的外交機制；南北朝以後，外交機制也逐漸制度化。唯獨三國，外交機制未制度化的結果，出使者官職不定，個人特質最重要，其中又以口才佳、反應快、才性高及對時局掌握能力爲重要考量。
- 三、三國主事者皆重視來訪的使節，多親自接見，藉以了解他國內部發展情形。
- 四、由於三國分合不定，使節出使或結盟、求援；或求和、求降，往往擔負重大任務，與南北朝以後一般性的交聘活動，有極大的不同，其面對的挑釁與困難極大。

而交聘的場景就是外交交鋒的重要關鍵，三國使節在其中淋漓盡致的發揮，這也是三國外交活動中最精彩的部分。

三國交聘表

時間	出使國	對象	使者	事由	結果	資料來源
建安十三年 208	劉備	孫權	諸葛亮	結同盟誓。	促成赤壁之戰，大破曹操。	《三國志》卷32〈先主傳〉，頁878。
建安十五年 210	孫權	劉備		勸劉備取益州。	劉備回報拒絕，但後又攻下益州，引起孫權不滿。	《三國志》卷32〈先主傳〉，頁879-880。
建安二十年 215	孫權	劉備	中司馬 諸葛瑾	權以備已得益州使報欲得荊州。	劉備不予，孫權遣呂蒙奪長沙等三郡；劉備亦遣兵下公安，關羽入益楊。	《三國志》卷32〈先主傳〉，頁883；卷52〈諸葛瑾傳〉，頁1231-1232。
建安二十年 215	劉備	孫權		曹操將攻下漢中，劉備懼失益州，使求和。		《三國志》卷47〈吳主傳〉，頁1119。
建安二十年 215	孫權	劉備	諸葛瑾	劉備求和，孫權遣使回報。	更尋盟好，分荊州，以湘水為界；長沙、江夏、貴陽以東屬孫權；南郡、零陵、武陵以西屬劉備。	《三國志》卷47〈吳主傳〉，頁1119-1120。
建安二十二年三月 217	孫權	曹操	都尉徐詳	曹操大軍南征，孫權遣使詣曹操請降。	曹操報使修好，誓重結婚。操先以弟女配孫策弟匡，又為子彰取貴女。	《三國志》卷47，頁1120；《三國會要》卷25，〈職官四·出使〉，頁482。
建安二十四年十二月 219	孫權	漢 (曹操)	校尉梁寓	孫權遣寓觀望曹操，並奉貢於漢及令王惇市馬。	曹操表孫權為驃騎將軍、假節、領荊州牧，封南昌侯。權上書稱臣於操，稱說天命，曹操以權書示外以觀眾心。	《三國志》卷47，頁1121 註一裴注引《魏略》。
建安二十五年春	劉備	曹丕	掾人韓冉	劉備聞曹公薨，遣使奉書弔，並	曹丕惡其因喪求好，敕荊州刺	《三國志》卷32，〈先主傳〉頁889 註二裴

時間	出使國	對象	使者	事由	結果	資料來源
220				致賻贈之禮。	史斬冉絕使命。次年，劉備稱帝。	注引《魏書》。
延康元年七月 220	孫權	曹丕		孫權遣使奉獻。		《三國會要》卷 25，〈職官四·出使〉，頁 483。
魏黃初元年 220	孫吳	曹魏	浩周	魏文帝即帝位，權遣使稱藩。	浩周為魏舊臣，為孫權所獲，曹丕即位，孫權為結好於魏，特釋回，為權當說客。	《三國志》卷 47〈吳主傳〉，頁 1121；頁 1127 註三裴注引《魏略》。
魏黃初元年冬 220	曹魏	孫吳		魏王受漢禪，遣使以孫權為吳王。	權詔浩周與使者俱往。	《三國志》卷 47〈吳主傳〉，頁 1128。
魏黃初二年七月 蜀章武元年 221	孫吳	蜀漢		劉備率軍襲孫權，權遣使求和。	劉備盛怒不許。	《三國志》卷 32〈先主傳〉，頁 890。
魏黃初二年八月 221	孫吳	曹魏		權遣使稱臣，卑辭奉章，並送于禁等還曹魏。	劉曄等人識破權意，但曹丕仍受吳降。	《三國志》卷 2〈文帝紀〉，頁 78。
魏黃初二年八月 221	曹魏	孫吳	太常持節邢貞	奉策拜孫權為大將軍，封吳王，加九賜。	劉曄、夏侯尚等人反對。	《三國志》卷 2〈文帝紀〉，頁 78。
魏黃初二年八月 221	孫吳	曹魏	中大夫趙咨	答謝魏文帝之封。		《三國志》卷 47〈吳主傳〉，頁 1123。
魏黃初二年八月 221	孫吳	曹魏	西曹掾沈珩	以前次聘魏，文帝欲封權子孫登，權以子幼上書辭封，重遣使陳謝，並獻方物。		《三國志》卷 47〈吳主傳〉，頁 1123。

時間	出使國	對象	使者	事由	結果	資料來源
魏黃初二年十一月 221	曹魏	孫吳		文帝遣使求雀、頭香、大貝、明珠等物。	孫權群臣以「荊、揚二州貢有常典，魏所求珍之物非禮也，宜勿與。」孫權以「方有事於西北，江表元元，恃主為命。比所求者，於我瓦石耳」，皆具與之。	《三國志》卷47〈吳主傳〉，頁1124註六裴注引《江表傳》。
魏黃初三年九月 吳黃武元年 222	曹魏	孫吳	侍中辛毗、尚書桓階	往與孫權，盟誓並責任子。	吳王辭讓不受。曹丕欲伐吳。十月，孫權遂改年，臨江拒守。	《三國志》卷25〈辛毗傳〉，頁698。
魏黃初三年十一月 222	孫吳	蜀漢	太中大夫鄭泉	因魏伐吳，權使聘於白帝。	吳蜀復通，但孫權仍與魏文帝往來，至後年乃絕。	《三國志》卷47〈吳主傳〉，頁1126。
吳黃武元年 蜀章武二年 222	孫吳	蜀漢		孫權聞劉備住白帝，甚懼，遣使請和。	劉備許之，遣使報命。	《三國志》卷32〈先主傳〉，頁890。
蜀章武二年 吳黃武元年 222	蜀漢	孫吳	太中大夫宗瑋（宋瑋）	因吳來報。	吳漢復通。	《三國志》卷47〈吳主傳〉，頁1126。《資治通鑑》卷69〈魏紀一〉，頁2209及《三國志》卷32〈先主傳〉，頁890皆載為「宗瑋」；《三國會要》卷25〈職官四〉頁485，為「宋瑋」。
魏黃初三年 吳黃武元年 222	曹魏	孫吳		魏求荳蔻。		《三國會要》卷25，〈職官四·出使〉，頁482。
吳黃武元年 魏黃初三年 222	孫吳	曹魏		孫權使具上破蜀所得印綬土地，並表將吏功勳。		《三國會要》卷25，〈職官四·出使〉，頁482。

時間	出使國	對象	使者	事由	結果	資料來源
吳黃武元年 魏黃初三年 222	孫吳	曹魏		破劉備後，孫權以使聘魏，具上破備或印綬及首級、所得土地，並表將吏功勤宜加爵賞之意。	文帝報使，致鯁子裘、明光鎧、駢馬，又以素書所作典論及詩、賦與權。	《三國志》卷 47〈吳主傳〉，頁 1125 註一裴注引《吳歷》。
魏黃初三年 吳黃武元年 222	曹魏	孫吳	侍中辛毗、尚書桓階	初孫權外托事魏而誠心不款，魏乃遣使往與盟誓並徵任子。	孫權辭讓不受。魏文帝出兵，權卑辭上書，求自改悔。一方面臨江拒守。	《三國志》卷 47〈吳主傳〉，頁 1125。
吳黃武元年 十二月 蜀章武二年 222	孫吳	劉備	太中大夫鄭泉	魏吳數戰後，權使使聘劉備於白帝兩方始通。	然孫權猶與魏相往來，至後年才絕。	《三國志》卷 47〈吳主傳〉，頁 1126
吳黃武二年 十月 蜀建興元年 223	孫吳	蜀漢	立信都尉馮熙	劉備死，孫權遣使弔備喪。		《三國志》卷 47〈吳主傳〉，頁 1130 註三裴注引《吳書》。
蜀建興元年 吳黃武二年 十月 223	蜀漢	孫吳	中郎將鄧芝（原官職為中郎將之）	劉禪即位，修好于吳。蜀致馬二百匹、錦千端及方物。《吳曆》載蜀致馬及方物，吳亦致方土所出以答，後以為常。	自是之後，聘使往來以為常，吳亦致方士所出，以答蜀漢厚意，促使吳絕魏，專與漢連合。	《三國志》卷 47〈吳主傳〉頁 1131 註四。
吳黃武年間 魏黃初年間	孫吳	曹魏	中大夫馮熙		馮熙太銳利，讓魏文帝不悅，送至摩陂，欲困苦之。熙引刀自刺，御者覺之，得不死，回國後上嘉之，賜鹽米。	《三國志》卷 47〈吳主傳〉，頁 1130 註三裴注引《吳書》。
吳黃武三年 夏 蜀建興二年 224	孫吳	蜀漢	輔義中郎將張溫	以報年前蜀使鄧芝之聘。	自是吳、蜀信史不絕。	《三國志》卷 47〈吳主傳〉，頁 1131。

時間	出使國	對象	使者	事由	結果	資料來源
蜀建興二年 黃武三年 224	蜀漢	孫吳	鄧芝	回聘，重結盟好。		《三國志》卷47〈吳主傳〉，頁1131註一裴注引《吳錄》。
蜀建興三年 吳黃武四年 225	蜀漢	孫吳	尚書令 陳震			《三國志》卷39〈陳震傳〉，頁984。
吳黃龍元年 四月 蜀建興七年 229	孫吳	蜀漢		權即帝位，使使漢，以並尊二帝之意往告於漢。	漢人以為交之無益，名體弗順，宜顯明正義，絕其盟好。諸葛亮不同意。	《三國志》卷39〈陳震傳〉，頁984。
蜀建興七年 五月 吳黃龍元年 229	蜀漢	孫吳	衛尉陳震	賀稱尊號。至武昌與孫權升壇歃盟。	吳蜀盟約，中分天下，以豫、青、徐、幽屬吳；兗、冀、并、梁屬漢；其司州之土，以函谷關為界。	《三國志》卷39〈陳震傳〉，頁984。
蜀建興十二年 二月 吳嘉禾三年 234	蜀漢	孫吳		諸葛亮率十萬大軍由斜谷攻魏，遣使約吳同時大舉。	吳於五月起兵。	《資治通鑑》卷72〈魏紀四〉，頁2291-2293。
蜀建興十二年 吳嘉禾三年 234	蜀漢	孫吳	右中郎將 宗預	諸葛亮死，孫吳恐魏承哀取蜀，增巴丘守兵萬人，劉禪派使使吳。	吳對宗預，禮亞於鄧芝。	《三國志》卷45〈宗預傳〉，頁1075-1076。
吳嘉禾三年 蜀建興十二年 234	孫吳	蜀漢	侍中申儀	諸葛亮死，孫權垂心西州，遣使與蜀申固盟好。		《三國志》卷62〈申儀傳〉，頁1412-1413。
魏青龍三年 嘉禾四年 235	曹魏	孫吳		魏帝使人以馬易珠璣、翡翠、玳瑁於吳。	盡以與之。	《資治通鑑》卷73〈魏紀五〉，頁2314。
蜀延熙中 吳赤烏末年 246-250年 左右	蜀漢	孫吳	宗預	交聘。	孫權賞宗預大珠一斛。	《三國志》卷45〈宗預傳〉，頁1075-1076。
孫權時	蜀漢	孫吳	張奉			《三國志》卷53〈董厥傳〉，頁933。

時間	出使國	對象	使者	事由	結果	資料來源
蜀延熙十四年 吳太元二年 251	蜀漢	孫吳	校尉樊建			《三國志》卷 35〈董厥傳〉，頁 933。
蜀延熙十八年 吳五鳳二年 255	蜀漢	孫吳			吳將軍孫儀欲于宴會中殺孫峻，結果事洩，孫儀等人自殺，死者數十人，並及公主魯育。	《三國志》卷 64〈孫峻傳〉，頁 1140。
吳太平元年 蜀延熙十九年 256	孫吳	蜀漢	刁玄	孫亮使刁玄告亂於蜀。		《三國會要》卷 25〈職官四·出使〉，頁 486。
吳永安四年 蜀景耀四年 261	孫吳	蜀漢	五官中郎將薛珣	聘問、求馬。	吳主問漢政得失。	《三國志》卷 53〈薛綜傳〉，頁 1255。
蜀炎興元年 十月 吳永安六年 263	蜀漢	孫吳		魏伐蜀，漢人告急於吳。	吳遣軍以救漢。十一月蜀亡，吳軍罷兵，魏策動武陵夷叛，至月底平定。	《資治通鑑》卷 78〈魏紀十〉，頁 2469。
蜀炎興元年 魏景元四年 263	蜀漢	曹魏	侍中張紹、光祿大夫譙周、駙馬鄧良	請降。	蜀亡。	《三國志》卷 33〈後主傳〉，頁 900。
魏咸熙二年 三月 吳甘露元年 265	孫吳	曹魏	大鴻臚張儼、五官中郎將丁忠	弔祭司馬昭。		《三國志》卷 48〈孫皓傳〉，頁 1165。
魏咸熙二年 三月 吳甘露元年 265	孫吳	曹魏	光祿大夫紀陟、五官中郎將弘璆	報聘請和。	徐紹於半途言中國之美者，吳主怒，追還殺之。陸凱勸之，吳主雖不出兵，然遂與晉絕。	《三國志》卷 48〈孫皓傳〉，頁 1164。

參考文獻

一、史料

司馬光著、胡三省注，新校資治通鑑注，台北：世界書局，1980年9版。

房玄齡等著，晉書，台北：鼎文書局新校標點本，1979年2版。

陳壽，三國志，台北：鼎文書局新校標點本，1974年。

常璩著、劉琳校注，華陽國志，成都：巴蜀書社，1984年。

盧弼，三國志集解，四部善本新刊，台北：漢京文化事業公司，1981年。

錢儀吉，三國會要，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

趙翼，廿二史劄記，台北：華世出版社，1977年。

二、專書

王仲榮，魏晉南北朝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

傅啓學編著，中國古代外交史料彙編，台北：國立編譯館中華叢書編審委員會，1980年。

黃寶實，中國歷代行人考，台北：台灣中華書局，1969年。

鄒文海，政治學，台北：三民書局，1970年10版。

韓國磐，魏晉南北朝史綱，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

三、論文

中文部分

尹韻公，〈從荊州爭奪看三國前期的外交鬥爭〉，《文史哲》1981-5（總146期），1981年9月，頁37-42。

朱紹侯，〈吳蜀荊州之爭與三國鼎立的形成〉，《史學月刊》1991-1（總189期），1991年1月，頁14-24。

傅樂成，〈荊州與六朝政局〉，《漢唐史論集》，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77年，頁93-115。

鄒雲濤，〈試論三國時期南北均勢的形成及其破壞〉，《魏晉南北朝史研究》，成都：四川省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86年3月，頁128-145。

趙國華，〈三國時期的吳蜀關係〉，《華中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36卷1

期(總125期),1997年,頁113-119。

鄭欽仁,〈宋魏交聘表〉,《大陸雜誌》第22卷6期,1961年3月31日,頁18-23。

黎虎,〈孫權對遼東的經略〉,《北京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1994-5(總125期),1994年9月,頁41-47。

黎虎,〈魏晉南北朝尚書主客曹及其外交管理職能〉,《漢學研究》第17卷2期,1999年12月,頁187-216。

盧華語,〈蜀國兵力與諸葛亮北伐用兵考〉,《北京師範學院學報》1991-2(總97期),1991年4月,頁30-34。

簡修煒、莊輝明,〈東吳的基本國策與孫權的戰爭謀略〉,《學術月刊》1991-2(總261期),1991年2月,頁62-68。

魏殿文,〈蜀漢將領東征探微〉,《文史哲》1997-5(總112期),1997年,頁123-125。

日文部分

矢野主稅,〈魏吳蜀の政治的社會的獨自性について〉,《長崎大學教育學部社會科學論叢》25,1976年3月,頁1-27。

谷口房男,〈三國時代の蠻について—孫吳の武陵蠻對策を中心として〉,《白山史學》15、16,1973年3月,頁81-99。

Feng Chia Journa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pp. 159-186, No. 2, May 2001
College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Feng Chia University

The Study of Diplomatic Envoys of the Three Kingdoms

*Chih-Chia Hu**

Abstract

Diplomatic manipulation and wars were the two main tools that were used in dealing with political problems between two countries during the disunited period of the Three Kingdoms. The former was used to negotiate the conflict between kingdoms and the breakout of war was a symbol of diplomatic failure. During the earlier years of the Three Kingdoms, the priority for each kingdom was to ensure the complete control of its territories as well as to strengthen its internal construction and consolidation. Therefore, peace keeping was necessary and expected as well. Under these considerations, diplomacy was far more important than war.

Generally speaking, for each kingdom there was a clos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development of diplomatic policy and its internal stability. For example, Tsao Tsao and his son Tsao Pe had the control of the most fertile lands and bounteous resources among the Three Kingdoms. This advantageous position provided Tsao Wei with a higher hand in handling diplomatic policy with its rivalries. With solid backup behind them, Tsao Wei would go to war instead of seeking diplomatic solutions. On the other hand, without the abundant resources in land, population, and political power as Tsao Wei, Wu and Shu had to form an alliance to oppose Tsao Wei. However, this alliance, which was formed as a result of political gain and practicality, could change quickly whenever Tsao Wei lost its power or Wu and Shu gained strength.

* Associate Professor, Section for History and Humanities Teaching, Feng Chia University.

Whether the purpose was routine or goal-oriented diplomacy, the chosen diplomat would strive for the best interest of the country. Especially during the period of disunity, most diplomats would face and deal with dangerous and difficult situations. Therefore, the diplomats during that period were very witty, talented, and literary gifted. Since the Battle of the Red Cliffs, the power struggle among Wei, Su, and Wu provided many skillful envoys with the opportunity to seek various allegiances among the Three Kingdoms.

The purpose of this paper is, through the detailed research of the historical documents in diplomacy of the Three Kingdoms, to analyze the diplomatic background of the Three Kingdoms and to reveal the mission of the diplomats as well a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hoosing the proper envoys for the job.

Keywords: diplomatic envoys, the Three Kingdoms, diplomacy